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美国学者们以为“美国的资本、发展援助、文化价值及政治、经济制度的扩散将启动经济发展过程”^①。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政治混乱，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军队用暴力推翻了文职政府，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并统治了社会。自 1960 年至 1980 年，成功的军事政变在亚洲地区发生了 15 次、非洲地区 36 次、中东地区 1 次、中南美地区 28 次^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在权威主义政府的强有力的组织或干预下成功地推进了现代化。韩国就是典型的一例。

一、韩国现代政治史的基本特征

纵观韩国现代政治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形式上建构了民主主义的制度框架，而实际政治过程却是权威主义。自 1948 年至 1993 年，在长达 45 年之久的时间里

^①（美）C·戴约等著，王浦劬译：《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1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韩）中央日报社编：《民主政治之路——如此艰难》，24 页，月刊中央，1988 年 3 月号特刊。

一直是（仅存在 9 个月的张勉政权除外）排除民众的参与、少数人决定政策、权力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体制。正是第三共和国权威主义政府成功地启动和推进了现代化，使贫穷落后的韩国一跃而成为新兴工业国。1962 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有 23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 87 美元。而到 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727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6316 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152 个成员国中，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十三位^①到 1996 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4926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10908 美元^②。

第二，军人长期执政。自李氏朝鲜（14 世纪）以来，韩国社会一直是“文人优位”的社会，从未有过军人执政。1961 年，朴正熙将军领导的“5·16 军事政变”到卢泰愚执政的第六共和国首届政府，在长达 32 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是军人执政。

第三，政治制度化程度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政权结构变化频繁。李承晚执政的第一共和国时期，权力逐渐集中到政府，特别是总统手中，以至爆发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迫使李承晚下野并流亡美国，副总统自杀。第二共和国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扩大了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结果导致了社会的一片混乱，被朴正熙将军领导的“5·16 军事政变”所推翻。朴正熙执政的第三共和国，又将内阁制重新改为总统制并把权力集中到政府，特别是总统手中。通过“维新政变”出台的第四共和国在诸多领域限制了国民的民主权利，甚至连议论宪法都成了违法。这种体制到全斗焕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有了一定的缓解，但其基本政权结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卢泰愚执政的第六共和国首届政府开始，

^① 邹志敏：《韩国经济国际化简析》（钟诚等主编：《韩国经济国际化与经济腾飞》，24 页，时事出版社，1993）。

^② 卢新德：《继续沿着经济国际化的道路前进》，298 页。

表 1—1 总统选举制度变化情况表^①

届别	总 统	宪 法	选举主式	选举机关	任期	连任
1	李承晚	制 宪 宪 法	间接选举	国会	4 年	1 次 连 任
2	李承晚	第 一 次 修改	直接选举	国民	4 年	1 次 连 任
3	李承晚	第 二 次 修改	直接选举	国民	4 年	首 任 总 统不限
4	李承晚	未 变	直接选举	国民	4 年	首 任 总 统不限
5	尹普善	第三、四 次修改	间接选举	两院联席会议	5 年	1 次 连 任
6	朴正熙	第 五 次 修改	直接选举	国民	4 年	1 次 连 任
7	朴正熙	第 六 次 修改	直接选举	国民	4 年	3 次 连 任
8	朴正熙	第 七 次 修改	间接选举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	6 年	无规定
9	朴正熙	未 变	间接选举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	6 年	无规定
10	崔奎厦	未 变	间接选举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	6 年	无规定
11	全斗焕	未 变	间接选举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	6 年	无规定
12	全斗焕	第 八 次 修改	间接选举	总统选举团	7 年	单任
13	卢泰愚	第 九 次 修改	直接选举	国民	5 年	单任
14	金泳三		直接选举	国民	5 年	单任

①赵虎吉：《韩国现代政治论》，34 页，东方出版社，1995。

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会的权力得到了恢复和强化，取消了讨国民和社会的诸多限制，从金泳三执政的第六共和国第二届政府开始，政治过程逐渐进入了民主化轨道。

表 1—2 国会国政监查权和调查权变化情况表^①

共和国别	国会届别	国政监查权	施行次数	国政调查权	施行次数
第一共和国	一届	有	1	有	24
	二届	有	4	有	37
	三届	有	11	有	51
	四届	有	3	有	6
第二共和国	五届	有	2	有	8
第三共和国	六届	有	5	有	11
	七届	有	8	有	8
	八届	有	2	有	3
第四共和国	九届	无	0	无	0
	十届	无	0	无	0
第五共和国	十一届	无	0	有	0
	十二届	无	0	有	0
第六共和国	十三届	有	4	有	4
合计			40		152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围

从宏观上看，韩国现代政治史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在韩国移植的过程。韩国从李朝末期被日本实行殖民统治至二战结束。随着二战的结束，韩国获得了独立，然而，这个独立并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获得的，而是他人送来的礼

^①赵虎吉：《韩国现代政治论》，87页，东方出版社，1995。

物。韩国独立后便成了冷战格局的焦点，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美国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价值体系移植到韩国。韩国为抵制来自北方的政治、军事威胁不得不在经济、军事、政治上依赖美国，并且全面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包括政治价值体系。在政治体制层面，独立和大韩民国政府的成立是一种历史的断层，从殖民地社会突然转向了独立国家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政治史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移植过程。然而，从文化层面上看，权威主义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消失，反而被强化^①，也没有因西方的影响而自然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现代政治史是西方价值体系与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激烈冲撞的过程，是二者相互渗透的过程。当然，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的政治理想，然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能否被移植到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完全不同的韩国社会呢？从韩国的实践看，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被移植的过程极为复杂、艰难和曲折。那么，被移植的经济、文化条件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韩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一开始就以强大的国家和软弱的市民社会起步的，是一个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步强大，国家权力逐步弱化的过程。而市民社会的成长是在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和主导下实现的。这个过程与民主的移植过程是同步的，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又相互影响。那么，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的呢？是通过什么渠道发挥影响的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从韩国的现代政治史看，“经济发展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并将必然导致政治发展”这一命题是成立的，但是，经济发展对政治

^① 这个问题将在第二章详述。

发展的效应在短期内是反面的，即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6 千美元以下的时候，政治体制依然是权威主义体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即现代化是由权威主义体制，甚至是由军部权威主义体制启动的。韩国的案例告诉我们，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并非是同步的。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为了深入研究上面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本研究选择了“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政治条件”这样一个角度，将重点讨论如下几个中观层次的问题：

1. 为什么现代化是由权威主义体制启动的？
2. 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权威主义体制是怎样形成的？
3. 为什么权威主义一直伴随着现代化过程？
4. 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军人长期执政？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政治条件的角度，说明和解释权威主义体制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韩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权威主义体制曾经历过几次重大变化，如李承晚时期的文人权威主义，朴正熙时期的军部权威主义及全斗焕时期的军部权威主义等。本研究在通盘考虑整个现代政治史的前提下，将讨论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60—70 年代，即第三、四共和国时期，也即朴正熙时代。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韩国现代政治的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已有了几部专著，如《韩国现代政治论》^①、《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②、《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及其对南韩经济发展的影响》^③等。

笔者的《韩国现代政治论》从政治学的角度概述了现代韩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政府及其运行、政治文化等。任晓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尹保云的《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及其对南韩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朴正熙政权形成的背景和特征及其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关系。

二、韩国的研究

韩国学术界的各个流派因所持的立场和分析角度不同，对权威主义形成原因的说明存在很大的差异，可大致归纳为综合主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等三大流派。60年代和70年代，在中南美“工业化将导致民主政治”的现代化理论被证明缺乏适用性后，出现了诸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官僚权威主义理

①赵炜（即赵虎吉）著，东方出版社，1995。

②任晓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③尹保云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由天津出版社以《韩国为什么成功》为书名，于1994年出版。

论”等试图重新说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思潮。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韩国学术界开始广泛吸收上述理论并形成了不同流派。

结构主义流派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结构首先受制于世界经济体系。因此，规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分工状况和参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程度。奥得尼尔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就是从这种角度系统地说明了第三世界国家权威主义体制的形成原因^①。姜珉、韩相振等结构主义派用“官僚权威主义理论”说明韩国权威主义体制的形成^②。官僚权威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即消费资料的进口替代向生产资料的国产化阶段转变时，必然出现民众部门的活跃化等现象，从而导致政治危机。消费资料的进口替代阶段向生产资料的国产化阶段的过渡，需要引进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吸收外资的政治条件。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政治要求、民众部门的活跃化、技术官僚作用的增大等三个因素互动关系的政治结果就是官僚权威主义^③。官僚权威主义理论脱离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倾向和单线发展逻辑，从南美的依附性发展现实出发建构了分析模式，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然而，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因以处在经常性变化之中的南美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推导出的理论，缺乏普遍的适用性。韩相

①（阿根廷）奥得尼尔：《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机构的形成与社会、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韩）韩相振：《第三世界的政治体制与官僚权威主义——依附性发展与政治社会的变迁》，韩吾尔图书出版，1984]。

②韩相振：《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社会》，法文社，1983 姜珉：《韩国官僚权威主义的生成》，《韩国政治学会报》第 17 辑，1983。

③关于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参见拙作《现代化与官僚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KOREA 研究》1995 年第 1 期。

振为补救这一局限性，提出了“断绝性”模式和“连续性”模式的概念，并用来分析韩国的现实，使韩国学术界对权威主义形成原因的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忽视了政治行为者，特别是国家的作用，因而具有其局限性。

行为主义派以朴光周、崔章集、李正馥、林玄镇等为代表^①。行为主义派认为，第四共和国即“维新体制”的形成并非像结构主义派所主张的那样，是现代化深化阶段所出现的政治紧张关系的政治结果，而是独占包括情报力、强制力在内的所有权力的朴正熙总统长期执政的权力欲望所致。这一派特别强调 70 年代初因冷战的解体而出现的南北对话、美国撤军等因素造成的国家安全危机和权威主义传统等社会因素。这一派的主张缺乏系统性，其观点主要是对结构主义派的批评。

综合主义派为克服结构主义派的经济决定论和行为主义派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提出了综合分析模式。崔完圭将“维新体制”的形成原因分为许可因素、诱导因素和决定因素，并以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了“维新体制”的形成。许可因素包括：①权威主义政治文化；②国家权力和总统权力的过大化；③美国影响力的减少。诱导因素包括：①经济发展的成果及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安定；②南北关系的缓和；③因冷战格局的解体而造成的安保危机。决定因素包括：①当权者的长期执政欲望；②当权者长期执政可能性受到挑战。崔完圭认为，这三个因

^①朴光周：《执政官僚主义的新重商主义国家论》（韩国政治学会编《现代韩国政治与国家》，法文社，1986）李正馥：《工业化与政治体制变化》（《韩国政治学会报》第 19 辑，1985）林玄镇：《现代韩国与依附理论》，汉城大学出版社，1987 崔章集：《现代韩国政治的结构与变迁》，喜鹊出版社，1989。

素群在同一时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维新体制”^①。

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理论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只能说明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的形成，而未能解释第三共和国权威主义的形成而且，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中观层次的理论，均未充分重视南化分裂、历史性因素等背景、环境方面的因素。综合主义理论试图克服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比较系统地考虑了各种相关因素，但因价值倾向的偏重，未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韩国学者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价值一边倒。绝大部分研究均以西方民主政治价值体系作为判断标准，对现代韩国的政治发展持否定的立场，尤其对60—70年代的政治即朴正熙时代的政治更是如此。如金云泰教授所指出：“对第三、四共和国的研究，大体上批判性研究占压倒多数”^②。诸如“第三、四共和国是反民主主义的独裁政权”^③、“脱离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形态，变成权威主义政治形态”^④、“独裁政权与民主势力之间压迫与反抗的恶性循环过程”^⑤等是大部分学者对第三、四共和国的评价和结论。显然，这些评价和结论是以西方民主主义为判断标准的，在他们看来，制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是理所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很显然，这些结论和评价缺乏客观和冷静。

第二，缺乏适合韩国现实的理论模式，几乎千篇一律地套用

①崔完圭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维新’权威主义形成原因的研究》，庆熙大学，1986。

②（韩）金云泰：《韩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韩国政治学会报，第21辑2号，1987。

③（韩）李正锡：《韩国现代政治论》，232页，一岩企划社，1992。

④（韩）金云泰等：《韩国政治论》，405页，博英社，1994。

⑤（韩）金浩镇：《韩国政治体制论》，56页，博英社，1992。

西方或中南美的理论。当然，西方很多学科的理论确实很发达，值得借鉴。但是，它毕竟源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而且某些理论具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因而，不一定完全适合于分析、说明和解释东方社会的政治。延世大学的朴永信教授痛心指出：“我国学问的认识模式并不是源于历史现实，而是胡乱地借之于外国。过去的一世纪是如此，光复后的半世纪仍然如此。先前是从东京进口，接着是纽约和巴黎等。……没有一种是来源于对我国现实的深思。”^①

第三，忽视韩国的历史现实。“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笔者认为，传统政治经验和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韩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文化层面上看，韩国现代政治史是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相互冲撞、相互渗透的过程。冷战格局以及南北分裂的局面也对韩国现代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在韩国学界这两个重要因素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不少学者在论述现代韩国政治时对上述两个因素有所论及，但都没有把它们当做独立的变项来对待或没有系统地讨论。

三、其他国家的研究

日本学界对韩国现代政治的研究相当活跃而深入，但是在 80 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对“开发独裁”的批评，而 80 年代以后则主要集中在权威主义解体和民主化问题上。韩国问题权威之一的东京大学的服部民夫教授指出：“学界只愿讨论韩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政府主导’，把‘5·16 军事革命’至 1987 年的‘民主

① 《韩国日报》，1995 年 12 月 9 日第 20 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 页。

化宣言’^①期间的政治体制规定为‘开发独裁’，并未说明‘开发独裁’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得到维持的，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那种支配，它与政治文化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等问题。只是一味地讨论作为经济发展的政治结果的权威主义的解体。”^②

服部民夫教授从人际关系网络的角度系统地说明了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服部民夫认为，在韩国，家庭和家族是社会集团的基础，而“孝”和“血缘的纯洁性”是维持“血缘关系连续性”的关键。“姻戚关系”是家庭和家族的第一个延伸，为了维持血缘关系的连续性，一个父系家族必须与另一个父系家族联姻，“门当户对”是维护血缘关系纯洁性的关键因素。地缘是家庭和家族的第二个延伸，而学缘则是第三个延伸。服部民夫认为，地缘和学缘是朴正熙政权凝聚力的文化基础，这个因素是朴正熙政权成为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关于韩国政治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应首推哥里高利·亨得森（Gregory Henderson）的《朝鲜的政治社会》^③。亨廷顿称这本书“在分析朝鲜的政治环境、政治发展的英文著作中最富有整体性的洞察力。根据我的推测，用朝鲜语、日语等英文以外的文字的著作当中恐怕也是如此”^④。亨得森认为，现有的政治理论无法说明韩国的政治发展，亨得森详细分析了韩国民

① 1987年6月29日，执政党新民党总裁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表示接受在野党关于间接选举总统制改为直接选举总统制为主要内容的宪改要求。这个宣言是权威主义体制出现解体迹象的标志。

②（日）服部民夫：《韩国——网络与政治文化》，第1页序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③（美）哥里高利·亨得森：《朝鲜的政治社会》，铃木沙雄·大乔重译，沙以麻日出版会，1973。

④同上书，亨廷顿的序言。

族的单一性（指人种和语言、文字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主要指儒教文化价值体系的普遍化）。亨得森认为，极富单一性和同质性的韩国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与王权之间不存在中间团体，所有精英分子通过科举制被有效地吸引到了王权之中。亨得森称社会的高度单一性和同质性为单极磁场，是中央集权化的基础。水平结构的弱化强化了垂直结构的力度，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亨得森称这种模式为“旋涡模式”，并用这个模式系统地分析了直到朴正熙政权为止的韩国现代政治，说明了中央集权主义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以及解体的条件和可能性。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

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政治条件的角度，说明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这一特征自然对政治体制提出特殊的要求。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先进发达国家不同，有明显的起点，但是，现代化作为一种过程毕竟不是历史的中断和断绝，而是历史的延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启动的。因此，特定的历史条件必然对现代化自身及其启动和推进的政治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的，这一特点在韩国尤为突出，即韩国是在南北分裂，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对峙，而且曾经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且处在临时停战，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战争的特殊的的环境下启动和推进的。这一因素对

工业化的内容、进程以及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政治条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化自身的特点、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冷战格局与南北分裂）等三个因素是影响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形成和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即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形成和长期存在是上述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果。

一、现代化与权威主义

关于现代化的涵义，有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流派的至少几十种说法。罗荣渠教授将众多的现代化的涵义进行了整理并归类为以下四种：

第一，现代化是指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历史过程。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和技术。

第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这里的工业化一词从广义上是“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而且，概括了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

第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总称。按照这个观点，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

第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成”。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角度考察现代化的^①。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上面的不同观点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强调了各自的着重点，不存在对错之分。在本文，现代化的涵义无需详细论述，只要限定它的范围就够了。在本文，现代化一词指的是第二种观点的涵义，即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而且包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

现代化的类型一般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①。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先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当然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具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第一，追赶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才起步的。这首先意味着起点低。其次，意味着它可以在早现代化国家的现状中间看到自己现代化的前景。再次，在早发内生型国家里，现代性因素已有了可观的积累，特别是在技术层次上，这些成果可以得到采借^②。

第二，有计划的行为过程。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因此，可以说，这种现代化实际上是落后国家为摆脱现状，加速社会发展所做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表现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政府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并往往成为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推进者，而且，由政府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工具^③。

第三，强行启动，急剧变革。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的积累程度很低，特别是资本的积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①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②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研究论纲》，《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86—89页。

③同上。

工业化就是资本的积累、分配、控制的过程，即解决资本的来源并将资本有效地投资和分配，使资本有效地与生产相联结，以发挥最大的效能的过程^①。这个过程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可能自然生成，而只能强行启动。在韩国，朴正熙政权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与“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建交，向越南战场派出军队等手段才解决了现代化的启动资本。

从历史学角度看，社会变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变，即微型的社会变迁，这是指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累性的渐变和突变。另一类是巨变，即巨型的社会变迁，这是指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质的变化。社会的巨变是一种长期性的变异，它可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创新性的巨变，这是独特历史条件凑合下发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一种是传导性的巨变，这主要是受外因诱导发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②。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就属于传导型巨变。这种巨变由于借助早发展国家的经济、技术，在短期内推行和完成工业化过程，必然是一种由主导力量在短期内动员、组织各种资源的过程，为效率最大化，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的过程。这种过程不可能是渐进的自然生成过程，而是急剧的人为的变革过程。

第四，全面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带有明显的全面性特点。即现代化一开始，就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铺开，试图在同一个时

①（韩）张达重：《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韩国政治学会编《韩国的政治——争论点与课题》，287—288页，法文社，1993）。

②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详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15—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间里，就将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在不同阶段上分别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或社会的全面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现代化的主导势力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可能性^①。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从政治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政治两个角度考察。

现代化的经济方面十分引人注目，以致许多人把它看做现代化过程决定性的中心力量。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的知识 and 政治方面，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和领导人动员资源的能力。^②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以追赶性、全面性、计划性为特征的工业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强行启动的急剧的变革过程。这种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对政治上层建筑有强烈的要求，这就是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而且必须由那些立志推进现代化并且具有现代知识的政治集团掌握政权。

亨廷顿提出了“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的著名的命题^③。亨廷顿给出了三个公式：

- (1) $\frac{\text{社会动员}}{\text{经济发展}} = \text{社会挫折感}$
- (2) $\frac{\text{社会挫折感}}{\text{社会流动机会}} = \text{政治参与}$
- (3) $\frac{\text{政治参与}}{\text{政治制度化}} = \text{政治不稳定}$

①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研究论纲》，《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

②（美）C·E布莱克著，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1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41页，华夏出版社，1988。